

国立中山大学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旧藏唱本考略^{*}

黄仕忠 关瑾华

[摘要] 1927年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由顾颉刚先生发起收集俗曲唱本,在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展览,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最早有意识收集俗文学文献的举措,这些旧藏唱本于2005年末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料室被发现,共有12类2000多册。考察这些唱本,有助于了解当时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、湖南等地区曲艺的情况。这批唱本的来龙去脉,也折射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机构的变迁轨迹。

[关键词] 风俗物品陈列室 民俗学会 唱本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机构

[中图分类号] I207.3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4-0890(2009)03-042-08

风俗物品陈列室,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于1928年3月26日布置开放的一所博物馆式的展览室。它也是民俗学会的一个重要展示窗口。民俗物品陈列室的收藏,从服饰到生活用具,及各种乐器、风俗信仰类的物品,总数量在一万件以上。1928年秋的《民俗周刊》上,曾以《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》(下文简称“1928年《目录》”)^①为题,连载当时所已展出的藏品目录。其中书类641种,著录了书名与册数,物品类180种,著录有物品名与件数。由于《民俗周刊》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的巨大影响,中山大学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之名,也广为学界所知,这份目录的内容,也被后人经常引用。但遗憾的是,后来由于战争、迁校、动乱等种种原因,不仅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,其众多藏品的去向,也成为一谜团。其中的器物类,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,大部分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所继承,而书籍部分,则下落不明。由于1928年《目录》著录过简,所记唱本的来源,也是语焉不详,故而无从复核,每令学者抑腕叹息。

幸而神物天佑。2005年岁末,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在清点藏书时,发现一批未曾编目的书籍,大多钤有“国立中山大学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·民俗学会”、“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”、“国立中山大学·人类学部”等印记。细加核对,不禁令人额手加庆。——原来这批书籍,也正是久已失落的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旧藏唱本。

一、遗存书籍之发现与调查

该批书籍现移存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,共25扎2000余册。由中文系资料室移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时,曾按照之前发现时的捆扎进行了简单的清点工作,作成一份简要目录,包括每一扎内包含的可辨认的书名及其册数。我们的调查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开展。从出版者来看,同一扎内的书籍多为同一地出版,整批之内,以广州、潮州、湖南三地最多,另外尚可见桂林、厦门、越南、上海等地。从内容上看,绝大部分为戏本和唱本,另有少数民间生活指南类书籍,如《妇孺信札材料合编》

[作者简介] 黄仕忠(1960—),男,文学博士,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研究员,中国古文献研究所、资讯管理系教授(广东广州,510275);关瑾华(1980—),女,广东阳江人,中山大学文学博士。(广东广州,510275)

*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岭南说唱文学及表演形态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:06JJD840020)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① 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》,《民俗周刊》,1928年9月、10月号。

是用粤方言口语来解释写信时常用的词汇，以便妇孺理解信札的内容。

我们对这批书籍进行了修补整理，将同书各册调整归并，作简要分类，其类目如下：

1. 广东出版的木鱼书：64种，约800册。以木刻、机器活字本居多，另有台山、开平等地出版的铅字本数种。

2. 广东出版的粤剧戏文：57种，62册。全部是粤曲研究社刊行的铅字本。

3. 粤乐工尺谱：2种，6册。

4. 潮州歌册：69种，约500册。

5. 潮曲（潮州地区的潮剧戏班的演出本）：104种，约110册。

6. 湖南出版的戏本、唱本：约150种（唱本存53种），约200册。

7. 桂林出版的戏本、唱本：约100种，约150册。

8. 厦门出版的歌仔册：45种，约60册。

9. 越南出版的：喃字30种32册（内有两册为复本）；拉丁文5种5册。

10. 各地出版的生活指南用书：约20种，约30册。

11. 上海石印的宝卷：约50种50册。

12.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林译小说”、“说部小说”等：20种50册。

这些书册中，凡钤有“国立中山大学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·民俗学会”印章者，均为民俗学会之旧藏。我们将钤有此印的书册，与1928年《目录》进行了对照，大略可见两者之间的重合情况。

首先，以出版地分扎的现象，与目录中所说明的“共二百三十八种俱购自潮州”、“共七十一一种购自厦门”、“共三十九种购自广西”的情况很相近；其次，我们整理编目后得到的潮州、厦门、桂林3地出版的书册情况，与目录中“潮州”、“厦门”、“广西”部分大致相符。

文献调查期间，我们在1929年1月26日出版的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》

上，获得了一份更为详尽的《风俗物品陈列室藏物》目录（下文简称1929年《目录》）^①。其中，前12类为物品，分别为“首饰”、“衣服鞋帽”、“音乐”、“应用器物”、“工用器具”、“小孩玩具”、“赌具”、“神的用具”、“死人的用具”、“科举的遗物”、“官绅的遗物”、“迷信的品物”，以号数、物名、用途、何地、日期、件数、备载为项目列表记录之，共359种；第13类为“民间的文艺”，以下仅有“A广州”，未见“BCD”等其他地域分类标示，“广州”之下再分作“1小说”、“2南音”、“3曲本班本”、“4大栅，黄皮，碎锦”、“5迷信的书籍及签”、“6算术”、“7医书”、“8语言，经，史，及读本”、“幼学诗”、“对”、“9其他书籍”、“唱本”等小类。而“唱本”类之下的349种书目与1928年《目录》中的“共二百三十八种俱购自潮州”、“共七十一一种购自厦门”、“共三十九种购自广西”3部分的书目正好完全一致，那么这些唱本不属于“A广州”，而属于“B类”内容。换言之，之前的“小说、南音”等9小类则可能都“购自广州”，故冠以“A广州”之名，与1928年《目录》起首处冠以“广州流行的唱本”的做法一脉相承。关于“广州流行的唱本”这7字，1928年《目录》中有一个“勘误”：“二十五、二十六合刊之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中有‘广州流行的唱本’七字，是误印出的，因为下文不全是唱本，特此更正。”^②今以1929年《目录》对照之，可知“下文”实包含了“南音”、“曲本班本”、“其他书籍”等。又以当前所见书籍中的“广东出版的木鱼书”部分对照1929年《目录》中的“南音”部分书目，亦都能找到相符者。

1929年《目录》包含了风俗物品陈列室后来新得的物品，所以著录内容更为丰富。所以，后文我们主要借助1929年《目录》，对照目前发现的这批书籍，以便了解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书籍的存佚情况。

1929年《目录》中，“南音”、“唱本”两类的书籍，也正是目前发现的这批书籍的主体；“小

① 《风俗物品陈列室藏物》，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年报》，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集刊》第六集第62、63、64期合刊，1929年1月26日，第129—160页。

② 《民俗周刊》27、28期合刊，1929年10月。

说”、“算术”、“语言，经，史，及读本”、“其他书籍”4类的书籍，只是零星可见；“曲本班本”、“大栅，黄皮，碎锦”、“迷信的书籍及签”、“幼学诗”、“对[联]”5类书籍，则完全不见踪迹。

在目前发现的这批书籍中，钤有“国立中山大学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·民俗学会”、“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”、“国立中山大学·人类学部”等印记，而未见于1929年《目录》著录者，有粤曲研究社出版的粤剧戏文、湖南星沙等地的出版物、越南出版的喃字及拉丁文书籍、上海石印的宝卷等，当是1929年《目录》制作之后购入的图书。

这批书籍虽然主要来自于民俗学会风俗物品陈列室的旧藏，但也有一些例外。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林译小说”、“说部小说”、《法兰西志译略》等，书册内贴有1949年之前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票；另有数种《活页文选》、《广东文学战线》则是1960年代以后的出版物。这些书籍，当是中文系资料室在收藏过程，混入到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书籍里去的。

二、民俗学会与风俗物品陈列室

这些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旧藏书籍，最后竟栖身于中文系资料室多年，其中也隐含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机构的变迁历史。

1. 文科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时期（1927年8月—1931年1月）

1927年8月，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（下文简称“语史所”）筹建；11月，“民俗学会”成立；11月1日，《民间文艺》周刊发行。1928年3月，中大民俗学会在《国立中山大学日报》上发表了近期工作规划，一是开民俗学会研

究班，由顾颉刚、容肇祖、钟敬文、杨成志等授课；二是刊行民俗周刊及丛书；三是在旧教职员宿舍设立风俗博物馆，将各种风俗实物陈列，以供众览；四是实地调查及登报征求材料，制定各种调查表，向沪粤各报章杂志登广告，搜集民俗材料。^①3月21日，《民间文艺》易名为《民俗》周刊；3月26日，风俗物品陈列室正式开放；4月，民俗学传习班设立。12月14日国立中山大学考古学会成立^②。



图1 “国立中山大学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·民俗学会”印记

1928年元旦，语史所曾举办过为期三天的展览会，风俗物品部为参展的7部之一。“计各界前来参观者，数近万余人。”缘于“风俗物品之搜集，逐渐增多”，嗣有设立“民俗物品陈列室”的设想。积极搜集风俗物品，是这批热心风俗调查的学者们的信念，这日后也成为了民俗学会的“宗旨”：“本会以调查、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、各种族之民俗为宗旨。一切关于民间的风俗、习惯、信仰、思想、行为、艺术，皆在调查、搜集、研究之列。”而在风俗物品陈列室设立之后，“本会搜集所得之物品及一切材料，在风俗物品陈列室陈列之。”^③至1928年3月26日，“风俗物品陈列室布置就绪，即日开放。”^④

语史所组织结构图^⑤如图2所示。

① 见1928年3月26日的《国立中山大学日报》。

② 《本所大事记》，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年报》，第28页。

③ 《民俗学会简章》，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年报》，第10页。

④ 《本所大事记》，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年报》，第23页。

⑤ 参见吴定宇主编《中山大学校史（1924—2004）》，广州：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89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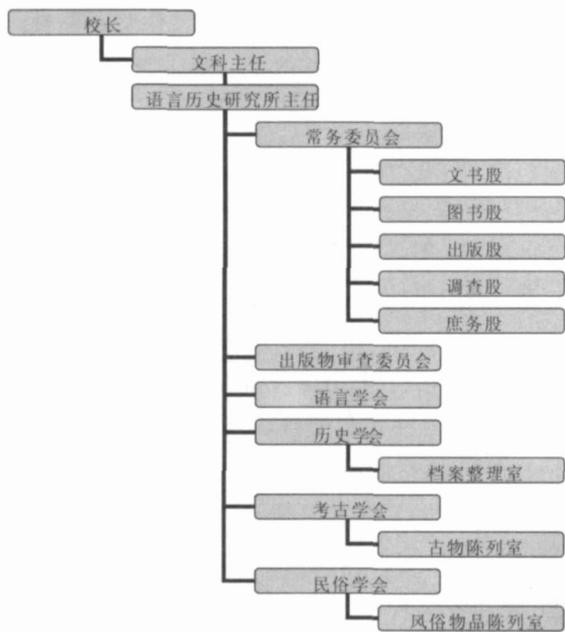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组织系统图

在这个组织系统图中，“民俗物品陈列室”隶属于“民俗学会”，与语史所的图书部门没有直接的关系。

民俗物品陈列室的日常运作，有明晰的工作细则：“第一条 各种风俗物品，须列册将名称，件数，出产地等项，详细登记，编列号数，以便查考。第二条 各种风俗书籍如唱本等，均须编目存查。……”^① 藏品的搜集购置，有列入预算的经费保障：“《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预算表（月计）》：民俗物品，200元。”^② 除了会员在调查研究中进行搜集，还得到各方热心人士的捐赠，藏品逐年递增。上文已列举1929年《目录》中记录的藏品情况。至1930年，据该年度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所载：“本所民俗学会自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以来，由征求及搜买所得之风俗物品，计有十三类。兹将其类别及件数录下：一 装饰类 三五六件；二 乐器类 六一件；三 家具类 一〇六件；四 烟具类 一七件；五 文具类 一〇件；六 工具类 二八件；七 玩具类 九四件；八 赌具类 一五件；九 神物类 七四六件（内有神像冥币符疏经签等六九一份器皿五五件）；十 官绅科举遗物类 一四件；十一 印刷物类 一四件；十二 摄影类

二件；十三 丧葬类 一件。以上十三类除神像冥币符疏经签等六九一份外，共大小物品七七三件。此外尚有关于民俗之书籍，及坊间流行唱本等二二四五册，兹将其数目册数列后：一、小说，一八六册；二、故事及童话，四三册；三、剧本，一五三册；四、曲本一班本，三八册；五、唱本，一五零八册；六、语言历史及读本，五二册；七、诗词歌赋，九册；八、对，七册；九、信札，二〇册；十、书法，五册；十一、算术，七册；十二、医书，二三册；十四、相书，七册；十五、地理，九册；十五、其他书籍，三六册；十六、迷信书籍，一一〇册。关于本所风俗物品详细目录，其大部分，可阅本所周刊‘民国十七年年报专号’，至本年新得者，将合旧有者另辑一分类目录印行。”^③ 与1929年《目录》相比，分类有所改变。遗憾的是，合并了“新得者”的分类目录，无从觅见，亦未见有引用者，大约是这一计划实际上并未实施。

民俗物品陈列室的设立，是民俗学会的研究计划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。据顾颉刚、余永梁在1928年12月25日所作的《本所计划书》，其中在“民俗”部分中明确提出：“五、钞集纸上之风俗材料。固然从前文籍所纪的风俗不详实，但那是时代的关系，不能深怪，还应该好好应用他。试问在纵的方面的研究，除了纸上材料，还有旁的多的法儿吗？所以旧有文籍，应先从各地方志，笔记，小说，文集，歌曲唱本等等钞集出来，作‘比较风俗学’。六、编制小说，戏剧，歌曲提要。‘民俗学目录学’，我们应提出这标题来。将各地民间小说，戏剧，歌曲，先编提要，使大家有个线索，研究方便。民俗学才会很迅速的发达，进步。”^④ 要展开“比较风俗学”与“民俗学目录学”的工作，首先必须收集大量的相关藏书。在这样的工作思路下，唱本、民间读物等出版物，得到大量的购置。据《民俗学会工作大纲》，其宏大的目标，则是在未来将民俗物品陈列室拓展为博物馆之一部：“收买足以表现风俗，习惯，迷信

① 《各股室办事细则·民俗物品陈列室》，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，1930，第40页。

② 《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预算表（月计）》，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年报》，第11页。

③ 《本所收藏物品·风俗物品》，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，第125—127页。

④ 《本所计划书》，顾颉刚，余永梁草拟，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年报》，第18—20页。

等之器物,文字,雕刻等。本所已有风俗物品陈列室一所,拟案经费及能力所及,加以扩充,使将来可成立历史博物馆民俗部。”^①

其中,第六项编制小说、戏剧、歌曲提要与本文讨论的内容关系最为密切。其主事者是顾颉刚。顾颉刚是北大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的骨干成员,早年致力于歌谣搜集,同时他也留心小摊子上的唱本,曾购得苏州唱本二百余册,一度因朋友嘲讽“唱本是下等作家特地做出来为营业之用,价值不高”而放弃了整理工作。到中大工作后,他意识到“歌谣固然有天趣,但是它大都偏向于抒情方面;要在里边求出民间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众们脑中的历史,它实在及不上唱本。唱本是民众里的知识阶级作成的,他们尽量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写在唱本里,他们会保存祖先口传下来的故事,他们会清楚地认识下级社会的生活而表现他们的意欲要求”^②。所以尽力搜集唱本,先后得到数千册。^③另据《民俗学会一年来的经过》(1928)记载:“至风俗物品,则计本所搜罗得的,有三百五十八种。民间文艺以致一切迷信的书籍有九百零八种。”^④亦可作印证。今天在书册上可见的“国立中山大学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·民俗学会”印章^⑤(图1),即是这一时期所使用的。

风俗物品陈列室是民俗学会乃至语史所宣传、推广形象的重要窗口。1928年秋,西湖博览会开幕,语史所应征选送展品,其中包括风俗物品。^⑥风俗物品陈列室也得到了学校当局的肯定,是年12月,“校长特给风俗物品购置费四百元,风俗物品陈列室大加扩充。”^⑦但1929年顾颉刚离

去,1930年《民俗周刊》停刊,相关工作陷于停顿。

2. 文学院·文史研究所时期(1931年1月—1935年6月)

1931年1月,“语言历史学研究所”改名为“文史研究所”,隶属于文学院,由文学院院长刘奇峰兼任主任。^⑧研究所的组织结构与语史所的相同。^⑨

据1934年版《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》,“设备·风俗物品”部分的介绍(页141),与1930年的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提供的信息完全一样,如此看来,这一时期风俗物品陈列室的藏品数量几无变化,说明了在1930年之后,新的搜集购买工作已经处于停顿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未能编成上文提到的新的分类目录。1932年秋,“广州市政府在越秀山举办广州市展览大会,本所亦送古物与民俗物品参加。”^⑩说明研究所的旧藏,仍然受到关注。

我们在书册中发现了“广州市展览会民俗组”用签(图3)。



图3“广州市展览会民俗组”用签

3. 研究院·文科研究所时期(1935年6月—1946年)

1935年6月1日,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中山

① 《民俗学会工作大纲》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,1930年,第33页。

② 顾颉刚,《湖南唱本提要·序》,选自《典藏民俗学丛书·中》,主编:叶春生,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,第1341页。

③ 《湖南唱本提要·序》,第1342页。

④ 《民俗学会一年来的经过》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年报》,第127页。⑤ “国立中山大学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·民俗学会”、“国立中山大学·人类学部”2种印记大多钤在书册的封皮上,而“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”印记则大多钤在内页上。

⑥ 《本所概述》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,1930年,第2页。

⑦ 《本所大事记》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年报》,第26页。

⑧ “二十年(1931年)九月,本校校董会第三次董事会议议决,本大学各科改称学院,本文科于是改称文学院。”参见《文学院沿革及将来计划》,《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》,1934年,第4页。

⑨ 《文史研究所概略》,《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》,1934年,第138页。

⑩ 《各所之现状·文科研究所》,《国立中山大学现状》,民24年(1935年)12月出版,第270页。

大学设立研究院,文史研究所改属研究院,改称文科研究所。所以书册上开始出现“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”的印记(图4)。



图4 “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”印记

图7),可以为证。



图6 “国立中山大学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·民俗学会”与“国立中山大学·人类学部”2印记并存

文科研究所组织结构图如图5^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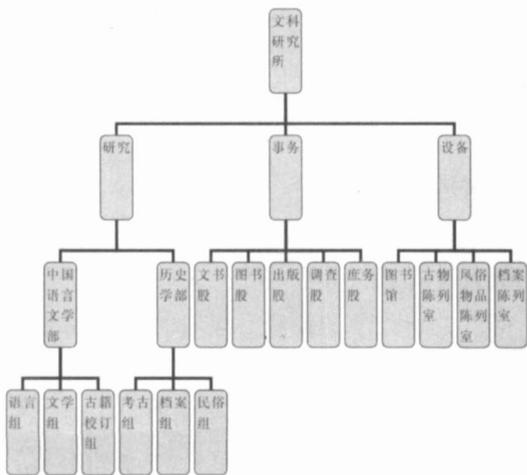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5 文科研究所组织结构图

与语史所阶段的组织系统图相比,有两处变化需要特别注意:一是“学会”的取消,代之以“学部—学组”的形式;与之相对应的是,之前分别系于民俗学会、考古学会、历史学会之下的风俗物品陈列室、古物陈列室、档案整理室,脱离隶属的研究组别,与图书馆一道归入“设备”部分。

“文科研究所”阶段涵括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数度迁校的日子,风俗物品陈列室的藏品当是随同迁移,因而在中山大学复校广州后仍然得以保留,书册上“国立中山大学·人类学部”与其他2种印记大多并存的情况(见图6、



图7 “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”与“国立中山大学·人类学部”2印记并存

4. 文学院·历史学研究所·人类学部(人类学系)(1947年—1952年)

1946年,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《废止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》,并制定《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》。根据相关规定,中山大学研究院自1947年起取消,所属各研究所改由各学院兼办。文科研究所划归文学院之后,于1947年2月将语言、文学、历史、人类四组改为四学部。^②书册上的“国立中山大学·人类学部”印记(见图8),当出现在“人类学组”改为“人类学部”之后。这一阶段的组织系统图未见,从“国立中山大学·人类学部”印记的形制可推测,此时风俗物品陈列室的藏品直接隶属人类学部,即从“设备”部分再次回归到“研究”部分之下。

1947年7月,文科研究所又奉令改编为中国

① 参见《中山大学校史(1924—2004)》,第121页。

② 《中山大学校史(1924—2004)》,第219页。

语言文学研究所(内分文学、语言两部)和历史学研究所(内分历史、人类两部)。1948年6月,历史学研究所人类学部主任杨成志教授建议以人类学部为基础,在文学院成立人类学系,并拟定设立计划及预算呈教育部核准。1948年8月,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文学院自1948年度起增设人类学系,杨成志任系主任。^①



图8 “国立中山大学·人类学部”印记

1949年1月3日,中山大学人类学会成立。会后展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,其中包括民间读物1500余种。^②

1952年10月,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由系主任杨成志教授率领调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。^③但人类学系所辖管博物馆、陈列室里的物品,则依然保存在中山大学。其中书籍部分则移归中文系资料室。

5. 中文系资料室时期(1952—2005)

在人类学系被调整、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被取消之后,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的藏书与物品分离。由于书籍部分以文艺性读物居多,所以归由中文系资料室收藏。进入中文系资料室之后,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林译小说”、“说部小说”等存放一起,并未加以编目,故后人无从查找其下落。直到2005年中文系资料室藏书全部移交中大图书馆时,才在清点时发现。

三、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唱本的价值

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唱本,最初是由顾颉刚先生发起收集的,民俗学会与中大文理科的师生

都曾经参与了这项工作。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最早有意识收集俗曲唱本的举措,因为着手早,所收集的版本,也多是早期刻本或排印本,传至今天,堪称珍贵。

由于中山大学地处广州,所以收藏最集中便是广东的唱本,其中以木鱼书与潮州歌册、粤剧班本、潮州戏本最为突出。广东周边的广西、湖南、福建地区的曲本,也值得一提。

木鱼书现保存完整的尚有65种,版本以清末刻本或机器版居多,涉及书坊共16家。其中在广州(羊城、省城)的有:以文堂、五桂堂、醉经堂、丹柱堂、文贤堂、五书堂;在佛山(禅山)有:近文堂、芹香阁、脩竹斋;在莞城(东莞)的有:萃英楼;地址不明的有:联益堂、璧经堂、永利堂、富文堂、荣德堂、福文堂。而就出版木鱼书的种数,以文堂、五桂堂、丹柱堂、芹香阁、醉经堂较多,主要集中在广州地区的出版社,可见当时广州是木鱼歌流行的集中地。

其次是粤剧戏文57种,62册。全部是粤曲研究社刊行的铅字本。当时粤剧形成未久,这些曲本是研究粤剧史的重要文献。

据肖少宋同学的调查,现存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中,源出于广东潮州地歌册、曲本,共173种。其中潮州歌册69种,潮州曲册104种。

潮州歌册中,有《山伯英台》、《雷神报》等九种长篇歌册、《肥丑拆字》、《唱忠恕》等11种短篇歌册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《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·潮州歌册卷》(2002)所失收,《新中华》、《南天门》等十八种长篇,经与影印本比较,影印本所据底本实有残缺。

潮州曲册都是二十世纪初潮剧戏班舞台演出本的刻版,封面题有演出戏班名称,多为李万利书坊所出版。所存曲册残、全各半。剧目上,与《潮剧剧目汇考》所著录剧目相比较,版本相同者仅17种,剧名相同而版本不同(都比《潮剧剧目汇考》著录的版本早)的有34种,而《汇考》没有著录的达52种,因此中心此批曲册正可补其缺。另外,多种曲册在题材方面与歌册相同,

① 《中山大学校史(1924—2004)》,第218页。

② 《中山大学校史(1924—2004)》,第227—228页。

③ 《中山大学校史(1924—2004)》,第257页。

如《玉针记》、《二岁夫》、《刘备招亲》等，有利于研究歌册与戏曲之间的关系。

这些潮州曲册的发现，还有助于纠正一些讹传。如1928年《目录》中有“从‘沙溪头’到‘双夺妻’共二百三十八种俱购自潮州”的说明，后来学者引述时遂将此238种全部归入潮州歌册内。而如上所述，实际上，这批书籍中，不仅有潮州歌册，而且还有潮剧戏班的演出本。

又如目录注明“购自厦门”部分，目前可见的45种均为歌仔册，以厦门“会文堂”石印者占多数。

1928年、1929年两份目录上记录的书籍，仍有部分未得见其书，如1929年《目录》的“曲本班本”类“各款河调七十三种”，今已佚失，最为可憾，因为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发见的“河调”作品仅有9种。

另一方面，一批湖南唱本、越南通俗文艺书籍，则是前述两个目录之外的意外发现。湖南唱本，是当年中大理科教授辛树帜和石声汉在1928年暑假回湖南的时候一同搜集本地唱本，合计90种。后来，姚逸之花了数月时间把唱本整理编述成《湖南唱本提要》，后来作为中大民俗丛书于1929年3月出版。这90种唱本，今尚存53种，另37种不知去。湖南唱本，今天保存下来的数量很少，这批曲本的重新现世，也必然会对湖南唱本的研究，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。

还有一批越南喃字及拉丁文书籍，包括喃字书籍30种32册，拉丁文书籍5种5册。其中一部分篇目为王小盾等编纂的《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》所失收；大部分版本为“提要”所未列，且属较早的传本。

再以桂林出版物为例，目前可见的近百种之中，明确标示为“名班戏文”的有60种，标示“与名班一样”的有13种。关于“名班戏文”的介绍，目前仅见于《中国戏曲志·广西卷》：“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藏有‘名班戏文’57种62册，部分为戏剧家齐如山所赠，部分为画家徐悲鸿于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购置，并于1956年赠送给中国戏曲研究所，桂林图书馆也藏有部分《名班戏文》。”^①“名班”指何班？“戏文”为何戏？更多文献的发觉及披露，能推进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。

要之，原国立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曲本的重新现世，将对广东、福建、湖南、广西等地的俗文学研究，带来重要影响，同时，也将使得我们对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有更为深入的了解。兹作简要陈述，以望更多的学人关注。

[责任编辑 黎国韬]

(上接第10页)草原、平原、山地、森林、湖泊、山川、河流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、物质创造与生产、土木泥石、竹麻草果、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，无所不涉。从文化空间进入到广义和广阔的非物质与物质范畴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、丰富性、无限性、全球性、天人合一性、物我合一性、人与自然相依相存性，推向了文化发展的前沿和人类文化保护行动视野，大大打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域、视野与境界。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双重存在和二合一模型的文化空间，引导

我们在对其开展研究中，走向物质与非物质关系的哲学——场有哲学。

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与非物质关联度分析，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性质和存有本质，是理解与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把钥匙，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分类保护的重要依据。

[责任编辑] 宋俊华

① 《中国戏曲志·广西卷》，北京：中国 ISBN 中心 1995 年版，第 488 页。